

溝通概念做為社會學研究的創新視角

蕭煒馨*

德國 Witten/Herdecke 大學文化反思學院社會系博士生

溝通在社會學中一向被理解為一種行動。當我們將溝通理解為行動之一，那麼它與其他行動的共同之處就在於，必須經由「人」這個媒介來展現，研究者必須經由人才得以觀察到行動。但是，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觀察「閱讀」、「書寫」這種並非面對面互動的行動呢？是否仍需要清楚的動機和目的這樣的因果序列才能觀察到行動？此時，研究者除了依賴行動者的自述建構出他的行動序列，是否能夠有一個較為普遍的概念將這類行動含括在內？

德國學者 Niklas Luhmann 與 Dirk Baecker 定義在系統理論的脈絡下，行動僅是溝通的表現形式之一。在建構系統理論與溝通理論時，也重新反省了社會學中各種概念所指涉的意義。特別是溝通概念在系統理論及溝通理論中更是佔有首要的位置。藉助系統理論，溝通不再縮限於人際之間的交往互動形式，而是搭配著理論中其他的概念，可以在較為一般性的意義下重新理解溝通。因為，在當前的網路時代不在場的互動形式已占了重要的位置；這樣的溝通概念，不但可以為社會學帶來新的研究角度，更能夠廣泛地將傳統社會學研究範圍擴展到新興的資訊社會學。

關鍵字：溝通、系統理論、行動

* weihsinhsiao@gmail.com

一、前言

社會學理論自從韋伯以來，就將行動概念奉為圭臬。不管是採取何種方法所進行的社會學研究，無一不是針對行動進行分析，量化研究分析行動的構成元素，舉凡動機、目的、時間、行動者的性別、年齡、社經背景等等，都可以被視為影響行動的變項，在統計上可以藉由數字或圖表呈現出來。質化研究則是透過研究者的引導和行動者的自述，為行動鋪陳出較為連續的行動脈絡，這主要依賴於文字的呈現。無論是藉由數字或文字來開展行動的脈絡和組成元素，都有可能進一步激起對於分析的分析，或者說：對分析的反思。在量化方面，包括討論中介變項、檢視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質化方面則探討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等等，顯然都是將反思的責任歸屬到研究者上，因為社會學預設研究對象是無可質疑的存在。

如果說我們總是必須透過具體事物的比喻才能想像或理解抽象事物，那麼不管是個人組成社會、個人的加總等於或不等於社會、大於或小於社會等等想法，都有助於我們對於「社會」此抽象概念的理解。但是在此出現了一個有趣的邏輯問題。並不是看到個人組成社會的過程，兩者的因果關係才成立，而是出現了個人和社會這樣的概念，才逐步充實概念的內涵，建立起概念之間的連結，這樣的過程，我們需要概念所具體指涉的對象，才能概略式的掌握概念所描述的現象。至少從理論（而非經驗）為出發點時，可以進行這樣的推論。

藉助電腦與網路的媒介，個人可以被想像為節點，大量且迅速的進行連結，而且這些連結與過程變得可見。例如發生各種自然災害時，網路上總是可以迅速集結志願者，分工合作地進行各種救災活動，不論是收集受災戶的資訊、回報救災資源的分配、收集來源以及仍然缺乏的物資等等，透過一些簡化的訊息顯示方式，特別是數字、文字或圖表的呈現方式，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耗費最少時間，接收到大量的訊息。行動甚至也不再需要身體位移或是意向上的指涉，而是透過碰觸滑鼠，就可以達到傳散訊息的目的。社群網站上每天都有各種需要幫助、支援、散佈和關注的主題，有許多外掛程式可以自動執行，使用者甚至只要安裝，即可一勞永逸地轉發選擇性的訊息。一直要到這樣的技術出現，我們才能想像一個無動機也無目標的行動，也許程式的執行仍然帶有傳統目的論的或需求想像：「是因為人（使用者）有特定的目的（需求）才觸發程式依照特定的方式而設計。」但是，這樣的歸因方式又將分析導向「人為何有需求」的困境中。如果伴隨著行動概念，總是出現這樣的分析困境，或許我們需要另外一個不同於行動卻可以將其一併容納進來的概念，以便能夠擴大社會學的分析範圍。意即，我們可以藉由另外一種提問的方式來展開我們的研究。當我們以溝通概念出發，是否能生產出一些不同於以往的分析結論，本文亦透過醫療社會學中的醫病關係、醫療論述和醫療技術進行經驗上的分析演示，以闡明溝通概念的著力點。

二、溝通與行動

行動一直都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之一，當行為主體將其主觀意識賦予行動之上，並在行動過程中指向另外一個主體，由此主體之間得以被連結起來。這是韋伯對於社會行動的定義。這樣的行動概念引發舒茲（Alfred Schütz）連結起社會學和現象學的思考方式，補充了社會學對於意識方面的討論。而 Habermas 則是延續著這樣的脈絡，詳細的分析了溝通做為一種特殊的行動類型，應該由各種面向進行規範，以達到溝通行動順利進行的目標。但是對於 Niklas Luhmann 來說，Habermas 理論中的問題在於，他將溝通理解為一種行動，也因此他的理論概念無法回答複雜性的問題。¹Luhmann 認為，溝通是將自己「標示」為一種行動，藉此我們才能推導出溝通。²也就是說，當我們利用行動的概念，我們無法回答行動之間如何以及為什麼被連結起來的問題。我們可以建構行動序列，每一個被指出的行動都具備某種特殊性，它們是被指認出來的事件，而不是發生的事件，因為事件只會發生在它發生的當下又立刻消失。接著就可以進一步地利用因果或是邏輯的方式將行動序列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當我們可以去質疑其他人為何以特定的方式將行動序列建構起來時，我們所需要做的並不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被建構起來的行動序列去取代之，而是必須看到行動之間所具備的任意性，意即行動之間有無止盡被關連起來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也就是 Luhmann 所說的複雜性。

但是，這樣的行動概念卻無法解釋行動如何源源不絕的進行下去，同樣地，也無法解釋行動序列為何有特定的開始與結束，從一階的觀察層次來看，很容易就發現行動序列的任意性，並不如行動者所觀察到的那麼固定或必然，但是從二階觀察的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知道：只要決定了開始，結束也就隨之被生產出來，它必然會發生，只是等待著在未來的某一刻，時間上的之後被標示出來，不管是開始或結束，都只是特定事件有否被標示的問題，也因此，這裡關乎的是差異，是當我們決定一個特定事件為起點之後，它就開始與其他未被標示為起點的事件區分開來，而不是某個事件「真的」是一連串行動序列的起點。由二階觀察角度所帶出來對於行動概念的反省在於，行動要被視為行動，首先是它具備了某些社會中所決定的特性，例如必定要有一個行動者、必須要有意圖上的指向性等，傳統的社會學就是不斷的去研究這些行動具備的特性並賦予其更豐富的內涵。但 Luhmann 為我們指出的是，利用區分的想法，我們可以將所有的行動不是歸到區分的一邊，就是歸到另外一邊，區分不是分類，而是一種邏輯上嚴格規定出來的思考方式。一組區分必定要足夠抽象，才能夠產生其自身的效果。在「社會系統」

¹ 請參閱 Niklas Luhmann (1971), *Systemtheoretische Argumentationen: Eine Entgegnung auf Jürgen Habermas*, in: Jürgen Habermas/Niklas Luhmann, *Theorie Diskussio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頁 293-294。

² 請參閱 Niklas Luhmann (1988),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頁 226。

一書中，Luhmann 為我們提供的其中一組區分為訊息／告知。過去社會學所指涉的行動（具備行動者、具有意圖指向性）可被歸到告知這一邊。溝通式的行動可以被理解為告知，因此，我們同時知道，存在著非溝通式的行動，這就是訊息。行動概念化約了眾多選擇的過程，我們標示了行動 A 而不是其他的 B、C、D 等等，是因為我們標示它的時候，同時也化約了它所能出現的各種因果關係及條件，而以行動者和意圖做為標示出行動的判準，就此看來，行動才能做為一個無時間性的事件被固定下來，而不是出現就立即消失的運作。一階觀察者往往能夠解釋為何是 A，而非 B、C 或 D，但是對於二階觀察者來說，A 之所以能出現是因為一階觀察者將它與其他三者標示為不同，而且這樣的標示接下來會導引出哪些可能的行動序列以及歸因的可能性。例如，當傳統社會學決定以行動為研究對象，可以解釋為是出於個人旨趣或是學科界限等等各種原因，但從二階的角度來說，行動做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它不同於意識和感知，並且還能夠說明，當行動是被決定出來的研究對象後，所引發的後續研究步驟就是去問及行動者的意圖，行動目的以及動機等等，傳統社會學視為是「行動內涵」的事物。意即，看出行動概念如何被歸因到特定的事物上，在科學系統中，行動這樣的概念還能夠不斷地再生產出各種有內容的研究結果，做為一個主題，行動這樣的概念引發了眾多討論。Luhmann 提供給我們的思考方向是：當行動被歸因到行動者身上時，其實只是一個化約複雜性後產生的結果。³既然行動概念是一個化約過後的結果，是一個社會不斷自我觀察的方式（因為溝通無法被觀察，行動才可以），那麼必定有一個更基本的單位，可以分析社會透過行動進行自我觀察，以及行動能不斷進行下去且彼此之間能關連起來的重要元素。當我們以採用這樣的元素回頭來分析行動，我們就會知道，研究行動不必然要回溯到行動者與其意圖，而是可將其視為不屬於（社會）系統的「環境」，他們會激擾行動，但卻不在社會學的研究範圍中。Luhmann 認為，Habermas 預設了一個外在的世界與唯心論式的系統之間的衝突，系統與外在世界是獨立且對立的，或者是系統建構了世界。這種神學式的思考無法解決複雜性的問題，或者也只是開啟了規範式的問題討論方向。⁴

以區分為出發點的溝通概念帶來的好處在於，我們無需依賴主體及其隨之而來的意圖、行動者等已經隱含各種價值的概念，可以「不需要特別參照到意識，而是首先要求了社會的指涉」⁵。Dirk Baecker 曾在「溝通」（Kommunikation）一書中談及：溝通概念是上個世紀值得注意的理論發明。[...]在溝通概念中，嘗試著將訊息、告知和理解同時想成是依賴的，並獨立於人類的心理及意識—這依賴指的是每個我們所熟知的溝通都是依賴著人類的（或者是依賴著動物，以及不久之後

³ 請參閱 Niklas Luhmann (1988),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頁 229。

⁴ 請參閱 Niklas Luhmann (1971), *Systemtheoretische Argumentationen: Eine Entgegnung auf Jürgen Habermas*, in: Jürgen Habermas/Niklas Luhmann, *Theorie Diskussio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頁 298。

⁵ 請參閱 Dirk Baecker, *Kommunikation*, Leipzig: Reclam Verlag Leipzig. 頁 20。

是一些機器)，獨立則是指溝通在它的形式與內容、行動與過程中，不會被回溯到一個意識所要表達、告知和傾聽的意圖，而是要求一個自身的、社會界定的指涉。⁶藉此，我們開始知道，所謂的溝通不再僅是涉及了兩個主體間訊息的傳遞，而總是必須參照到訊息、告知和理解的過程。Luhmann 在「社會系統」第四章中談到溝通的三個選擇時，總是使用著 ego 與 alter 的說法，而不是使用行動者或人，意味著他試圖捨棄過去將溝通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傳遞訊息的想像，而是更加強調溝通本身所構成的選擇運作，以及並不是人在溝通，而是溝通在溝通。一旦溝通發生了，人或者行動者也只不過是眾多形成溝通條件中的其中一個，並不佔有最終極的主導位置。另外，傳遞訊息這樣的過程還預設了訊息本身的同一性，意即從 ego 到 alter（或是由傳送者到接收者，總之就是兩端）之中，訊息不會受到任何干擾和變化，在傳送出去的此刻與接收到的下一刻沒有差異，時間也仿佛靜止，而是「如實」地被傳送與接收，但若是如此，就忽略了訊息隨時在轉換的這層運作，事實上，所謂的同一也是在溝通過程中才得以形成，因此，我們無法由訊息的內容來確保訊息的同一，就如同我們無法藉由物的不變來確保物的存在，Luhmann 認為，我們只能由 ego、alter 或者是外在於兩者之外的第三者來確立。

三、溝通做為選擇

關於訊息的同一與否問題，數學家 Claude Shannon 在他「數學的溝通理論」一書中提供了一個解決之道，這也是他的溝通概念帶給社會學最有啟發性的部份。首先，Shannon 研究的是訊號，他並不預設從傳送方到接收方的訊號是同一的，意即傳送方所送出的訊號，會由接收方再生產為另外一個訊號，即便兩個訊號是相同的，也必定是透過接收方將其視為同一，而接收方則是由一個眾多可能訊號的領域中挑選出一個訊號，此時訊號與其他訊號連結起來，因此訊息這個概念就取代了訊號，接收方必須在預設會有雜訊影響的狀況下，再生產出被傳送的訊號。因此，Shannon 說他是在機械的意義下討論溝通，因為這只關乎到傳送者及可能被傳送的訊息範圍、接收方和被挑選出的可能訊息範圍，以及如何控制雜訊的問題。溝通的基本問題在於，在某個位置上再度給出精準或近似的訊息，而這個訊息是在其他情況中被挑選出來的。⁷為了補充 Shannon 的說法，Baecker 曾經提出一個相當具有說服力的例子來說明：「字母 A 是可以做為訊息而再生產的，因為就算在有雜訊的傳遞管道中，意即字母的傳遞是扭曲而失真的，但是這個訊息(字母 A)出現的可能性，傳送者和接收者都同樣熟悉。雙方都立基於同樣的訊息選擇範圍(字母表)，因此他們可以經由過濾出雜訊，從接收到的訊息再生產出一開始傳遞的訊息。」⁸Shannon 談及再生產是正確的，因為就訊息的選取範圍已經

⁶ 請參閱 Dirk Baecker, *Kommunikation*, Leipzig: Reclam Verlag Leipzig. 頁 17。

⁷ 請參閱 Dirk Baecker, *Kommunikation*, Leipzig: Reclam Verlag Leipzig. 頁 62。

⁸ 請參閱 Dirk Baecker (2005): *Kommunikation als Selektion*, in: Dirk Baecker (Hrsg.), *Schlüsselwerke*

被確立來看，被接收的訊息的確可以再生產出一開始被傳遞的訊息。

重要的是，Shannon 所提出的解決方式只是溝通的一個特例：用技術的方式改善訊息傳遞的雜訊問題。若是更一般地來看溝通，訊息之所以能被再生產，必須同時確定訊息可能被選擇出來的範圍以及訊息本身的實現，換句話說，選取訊息的範圍與訊息自身就必須預設為無法確定的，這使得溝通是為穩定住不確定性而出現。所謂的「溝通做為選擇」也就是在說明這兩者的確定過程，而脫離了溝通等同傳遞訊息的想法。

藉由這樣的溝通概念，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各種社會現象。在技術的狀況中，可能性是固定的，譬如說不管是傳送者或接收者，只要是指涉到字母 A，所指涉到的訊息可能性也總共只有 26 種，但是在社會中的訊息可能性則是無限，當我們不是透過訊息不斷確立與自我生產，溝通根本無法出現。舉例來說，醫生只要聽到病人的自述病情並配合醫療儀器所呈現出來的數據與圖表，就可以判斷病情以及開處方箋，而無須（也無力）顧及其他任何無法關連到與病情相關的訊息，像是病人自述無力負擔龐大醫藥費，一般來說就會被醫生歸到社會福利的範疇，而不會對醫生的醫囑有任何影響。當然若是在精神科門診中，就會以另外一種方式看待這樣的自我描述了。另外，病人在病歷表上的基本資料，如年齡、性別和職業等，也都是被理解為診斷的背景知識，而非能與其他所有人共享的訊息，因此會有「病歷隱私權」的規範，顯示個人資料這樣的訊息只在醫學的界線內有效，並以不同於一般所理解的方式被解讀。就這樣看來，對於醫病關係的理解似乎也能夠以另外一種方式被理解，而不是直接訴諸於醫生與病人在醫學知識上的不對等所產生的角力與衝突。醫生的問診其實同時也在塑造病人自己對於身體與疾病的認識，反之亦然，問診的過程也不斷地被病患的自述所引導，不論這樣的自述是否被「選擇性地」忽略或重視，都顯示出其實權力概念只點出醫病關係的一小部分，權力概念可以讓我們觀察到「人」講出（看似）較有說服力的「話」或是做出各種行動（如反抗、順從或假裝順從），擁有不同的知識背景使得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是雙向且流動的⁹，但溝通概念其實更抽象地描述了醫療溝通不斷地被各種訊息導向不同的溝通方向，以及每個被選擇出來的訊息及訊息所涉及的脈絡，即便病人所提供的訊息被醫生拒斥或者忽略，其實也只是表示醫生試圖將問診過程引到他希望的方向，只是我們將這樣的溝通過程「化約」到行動上，所謂的行動也就可看成是企圖激擾溝通所進行的方向而已。

der Systemtheorie. Wiesbaden: VS Verlag. 頁 122。

⁹ 請參閱成令方 (2008)，〈醫病關係的新視角：醫「用」關係〉，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126-128。

四、醫療論述

在醫療行為中，其實是極度要求著病人將自己的感知轉化為溝通的。在醫院填著病歷資料、測量身高體重、與行政人員討論該掛哪一專科門診、等待看診、醫生的問診、繳費、領藥等這一連串的行動序列，都在要求病人與醫生透過訊息不斷的釋放來建構起他們對於單一身體及其現況的想像。傳送與接收的訊息都是透過被選擇後才出現的，我們不將選擇歸因於人，因為這並沒有對進一步分析與思考產生幫助，「更激進的溝通的選擇性意義是，只有當一個特定訊息在意義指涉的脈絡中，被觀察為選擇性確定下來的訊息時，溝通才出現。」¹⁰病人開始發現自己的身體可以用溝通的方式（而非感知）來表達、檢視甚至是與其他人討論。在過去，這被稱為是「醫療化」的過程¹¹，但當我們以溝通的角度來看，其實所謂醫療論述的建構，都是醫生與病人不斷地相互觀察才得以完成。這裡的觀察並不是指觀察病人的身體，而是醫生和病人在互相討論病情時不斷排除某些訊息，而挑選某些特定訊息，以便將討論過程引導至某個特定結論，但溝通並不停在這裡，反而會繼續影響後續的溝通，例如病人開始會用特定的方式描述自己的身體，用他所學習到，新的因果序列來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訊息被選擇出來的範圍會帶著這些溝通所生產出來的內容繼續擴張下去，同時生產了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確定的是那些病人與醫生的討論內容，經過運算後所沉澱下來的固有价值（Eigenwert），不確定的是那些排除於討論內容之外的訊息，例如有關社會福利的話題，會在未來的某一刻再度被實現出來，可能做為「問題」或「主題」而被討論著。溝通理論在醫療論述這點上所給出的貢獻在於，它可以涵括權力概念中所談及的雙向且流動的權力關係，卻無需預設一種「實在」，如醫生、病人的角色或是他們各自的社會地位，也無需預設衝突和階層，因為按照 Luhmann 的意見，現在已經不再是階層化的社會，而是功能分化的社會¹²，那些特定且緊密的階級連結已經演化為功能上的偶連，因此我們無法再採用過去的分析方式，醫生與病人間的階級再也不是可以輕易畫分開來的。溝通理論要說的是，醫療論述的社會面向在於溝通的過程，不僅限於病人與醫生的討論或互動，而是一連串可見的行動序列，以及不可見的被排除的訊息及訊息被選擇出來所指涉和參照的脈絡。而溝通在此的意義就變成是，為了能夠理解確定性的事物，致力於去確認那些未確定但可確定的事物¹³

¹⁰ 請參閱 Dirk Baecker (2005): *Kommunikation*, Leipzig: Reclam Verlag Leipzig. 頁 66。

¹¹ 請參閱成令方對於醫療化的註解。成令方 (2002)，〈醫「用」關係的知識與權力〉，《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 11-71。

¹² 關於功能分化的社會之分析請參閱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頁 84。

¹³ 請參閱 Dirk Baecker (2007): *Form und Formen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頁 23。

五、醫療技術

傅大為在《醫療與社會共舞》一書中為〈醫療技術〉這章所寫的導讀中談到，醫療技術的發展重新建構且形塑了新的家庭與角色，甚至改變了社會秩序，但是技術與社會是同時、共同製造（co-produce）出來的，缺一不可，沒有先後¹⁴，這也突顯出在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看待技術或科技的方式，意即 STS 的角度（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便是技術，也無法是純粹的科學發展，而是必定涉及社會面向。當我們談及技術，也必定關照到使用技術的使用者，這也是 STS 相當精采的一部份。當我們使用新的技術物時，也會挑戰到過去的使用經驗進而改變使用方式，使得新的技術物能產生作用。由這樣的分析角度看來，STS 有別於傳統社會學以「人」或「主體」為出發點的分析方式，認為一個新的科技必定經過與社會互相揉合的過程才能成為社會的一部份。¹⁵按照溝通理論來說，就連「物」本身也是由溝通所構成，正是因為如此它才做為社會的物而出現。若按照 STS 的觀點來看，他們仍然預設了技術物與社會的預先存在，但是這種本體論式的想像卻禁止我們再去追問，技術物與社會如何出現，而是關注在兩者如何相互影響的過程。一旦我們跟隨著這樣的預設，那麼應該要引起反思的是，其實研究者僅是在建構另外一種類型的行動序列，並歸因於行動者（在此指技術物和使用兩者），這樣的建構方式與分析角度則激起另外一個問題：那麼研究者的位置何在？這不僅是「是否有另外一種建構行動序列之可能性」的問題，甚至還是研究者建構這個行動序列時，究竟放棄了哪些事件或行動，以及選擇的判準又為何？例如 Latour 對於柏林鑰匙相當為人所熟悉的分析，提供了社會學從物的角度去思考社會關係。藉著物的媒介，我們可以觀察到分歧的社會世界及其關係，而不再是侷限於人或行動者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跟鑰匙有關的動作和零件，同時對人產生限制，也開啟了形成某種特定社會關係的可能性。藉由物，我們可以確定幾種由物發展出來的特定行動序列，亦即行動的諸多可能性藉由物而被化約。這支特殊設計的鑰匙在開門關門的動作之後，也同時將門上鎖，在開門的時候，鑰匙只能保持在鑰匙孔中而無法取出。這個行動程序展示了一連串住戶、房屋管理員、陌生人的關係。¹⁶

STS 觀點所帶來關於物的想像，極其多元，連結著許多抽象的社會關係，而這些抽象又無法窮盡的社會關係由於過度複雜，所以 STS 的研究者將其化約到技術物上，以便讓我們能想像及描述為多元的。就溝通理論的角度來說，即便 STS 的觀點使得技術物得以在溝通上確定下來，並對其繼續進行討論，但是他們卻以

¹⁴ 傅大為（2008），〈醫療技術導讀〉，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61。

¹⁵ 請參閱吳嘉苓（2008），〈新生殖科技、新性別關係？人工授精來台灣〉，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72。

¹⁶ 請參閱 Bruno Latour（2000），〈柏林鑰匙或如何以詞稱物〉，收錄於《物質與文化讀本》，孟悅、羅綱主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2-449

社會關係的不確定掩蓋了技術物本身也是不確定的這件事。因此，如果從溝通出發，就連技術物本身也是溝通所建構出來的，並不是「真的」有個新的技術出現，而是研究者自己預先做了新／舊技術的區分，再將部分社會關係的因歸給新技術，這樣的因果序列建構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在於 STS 由連結或關係出發，而不是由區分出發。由系統論的脈絡來看，在一開始選擇特定的技術來討論時，就已經排除了其他各種技術，這種化約讓我們可以去想像技術物的同一，好像它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實存著，事實上，這個技術物首先是透過與其他技術物的區分，意即從眾多可能性的選擇範圍中，才得以被選擇出來及實現，當它被挑選出來之後，溝通就同時也展開並持續進行下去。若是溝通從來都未曾停止，那麼表示該技術物的同一也只能經由溝通不斷堆疊之後才能出現，換句話說，技術物的特質或本質無法保證它必然被挑選，反而這只是它得以出現的條件之一（而且必然是事後才附加給技術物的）。當李佩穎與傅大為在〈婦產科的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一文中結尾提及台灣婦女的身體，是否有可能從一層層近代醫療所纏繞的技術之繭中，破繭而出呢？¹⁷這樣的問題時，「技術物只在溝通層次上才起著作用」的思考所能提供的反省是，身體是否真的遭受「技術的纏繞」呢？所謂的技術纏繞不就是研究者自身的建構與安置才得以出現的嗎？由溝通理論及差異理論所帶來的回答是，也許被技術纏繞的身體可能永遠都無法解放。一如溝通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當區別不斷生成後又消失，溝通透過區別引發下一個溝通時，所謂的「停止溝通」或「沉默」也不過就是另外一個啟動溝通的契機。在溝通的層次上來說，技術物與身體都是此刻被選取出來相互纏繞的選項之一，既然如此，我們所應該要注意的是，兩者纏繞如何進行下去或兩者如何被視為纏繞，或者，當其他可能性實現時，會帶來哪些另外的問題。即便技術某種程度上必須造成身體的損壞，但身體也並不全然是被技術綑綁住的，如文中提到醫療技術應該更加著重於另外一種婦產科技藝，而不總是動刀，以及也應該加強預防醫學的發展，使得手術的重要性逐漸在婦產科中降低，但這樣一來，所引發的後續問題有可能是，醫生必須更加專注，在整個醫療體系即將崩壞的目前，這樣的要求顯然並未關注到其他制度性的問題，以及若是更動整個行動序列中的一個元素，所引發的問題可能更是無法控制。若是從二階觀察的角度來看，就可以發現透過對歷史的檢視與反省，我們希望看到一個更好的明日、一個「突破」的可能¹⁸這種思考方式忽略了技術與身體的一旦開始纏繞，是永遠都無法解除的，如果企圖改變這樣的纏繞，只是使這兩者越纏越緊而已，因為所衍生的問題只會隨著每一次的試圖解開而越來越多樣化，如同企圖使溝通中止，只是引發更多溝通的可能性在下一刻被確定下來而已。就此說來，溝通理論的貢獻正好就在於，若是我們不採取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來看待技術和身體，而是一起關照到兩者被選取出來的脈絡，例如在醫學中身體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身體對於醫學又是如何回應，如

¹⁷ 請參閱李佩穎、傅大為（2008），〈婦產科的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70。

¹⁸ 請參閱李佩穎、傅大為（2008），同前引書，頁 270。

此一來，研究視野也就開闊了起來，而不只是為特定的意識型態發聲。

六、代結論

溝通概念所帶來的，是不同於過去總是討論社會關係、社會連結等的區分或差異想法。強調每個物的出現都不是自然生成或理所當然，而是在溝通的脈絡下才得以可能，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溝通絕對不是單指人際之間的互動，而是各種訊息不斷被選取出來、實現、消失又再度選取出來的過程。這是一個理論上重要的翻轉。當我們不再需要依賴物本身的特性或本質來分析它時，我們就進入一個不斷自我指涉的溝通之中，依靠著這個不斷在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區分中擺盪的溝通，物也才從此能為人所觸及，當然仍僅是指溝通上的觸及，而不是感官上的觸摸。這樣的思考方式專注於分析問題與問題的解決方式，卻不是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用另外一種提問的方式，當我們改變問問題的方式，同時問題的解決方式也會一併有所轉變。例如上述的例子中，當我們面對醫療論述的議題時，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醫生與病人之間已不再是知識或權力上的角力，而是互相在建立或確定他們對於身體的認識、疾病的定義、甚至是病情的診斷等等。在面對醫療技術時，從溝通出發則是可以看到醫療技術與身體之間不只是單方面的控制關係，因此身體要由技術中「解放」出來，而是在於，醫療技術和身體各自由哪些脈絡被選取出來，又排除了哪些可能性，以及為何特定的技術只能用於治療在特定的疾病和症狀，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些技術如何形塑出身體，而透過與身體的接觸，又如何影響後續的技術發展等等。

藉由新興的溝通理論對於醫療論述和醫療技術的分析以及和 STS 觀點的對話，本文期望能在傳統社會學的理论脈絡中激發一些新的思考與視野，並讓溝通理論在與實際的經驗言就上不至於缺席。

參考書目

Latour, Bruno (2000),〈柏林鑰匙或如何以詞稱物〉,收錄於《物質與文化讀本》,孟悅、羅鋼主編,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2-449。

成令方(2002),〈醫「用」關係的知識與權力〉,《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 11-71。

— (2008),〈醫病關係的新視角:醫「用」關係〉,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126-135。

吳嘉苓(2008),〈新生殖科技、新性別關係?人工授精來台灣〉,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72-280。

傅大為(2008),〈醫療技術導讀〉,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60-263。

李佩穎、傅大為(2008),〈婦產科的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收錄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台北市:群學出版社,頁 264-271。

Dirk, Baecker (2005): *Kommunikation*, Leipzig: Reclam Verlag Leipzig.

— (2005): *Kommunikation als Selektion*, in: Dirk Baecker (Hrsg.), *Schlüsselwerke der Systemtheorie*. Wiesbaden: VS Verlag. S.119-128.

— (2007): *Studien zur nächst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2007): *Form und Formen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Luhmann, Niklas (1988):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1971): *Systemtheoretische Argumentation, Eine Entgegnung auf Jürgen Habermas*, in Jürgen Habermas/ Niklas Luhmann, *Theorie-Diskussio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291-405.